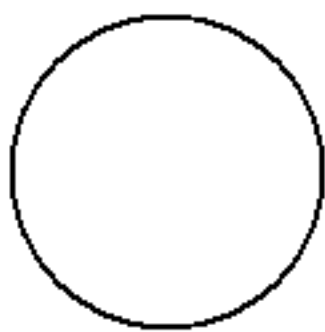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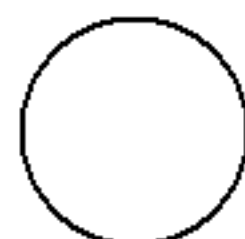
7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七期 ★

目 录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 苏 星 (1)

不违农时是领导农业生产的

一项重要政策 章 竟 (10)

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林一舟 (16)

进一步加强成本管理 赵少平 (20)

自然科学和实际应用 何祚麻 (24)

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和觉悟性

问题 宁 可 (29)

☆ 四月一日出版 ☆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

苏 星

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从整个的历史时代来看，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速度，会远远地高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速度。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之所以能够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速度，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从客观条件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它比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从主观条件来看，党和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有可能根据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并且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的行动，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再生产不断地扩大。我这篇文章不可能全面地探讨这些条件，打算只对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具体问题，作一些说明。

任何社会的扩大再生产的速度，首先都是由积累增长的速度决定的。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也不例外。因此，研究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必须从研究积累的来源、数

量和增长速度开始。

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产品从价值上看，包括三个部分：（一）转移过来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原料、材料和燃料等）的价值；（二）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为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为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第一部分，是原有的价值的转移，在再生产过程中，它必须转化为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和维持现有生产规模所必要的流动资金（不包括工资基金），这部分价值是不能用于积累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即国民收入），其中，第二部分必须用于补偿现有劳动者的消费基金，也不能用于积累。能够用于积累的只有第三部分，即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不可能全部用于积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中，总要有适当的部分用来增加现有工人的工资和农民的劳动报酬，这部分价值，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劳动者的必要劳动。除此以外，还需要从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中，扣除用于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保



健方面的費用，扣除国家管理費用和国防費用，扣除为丧失劳动力者所設立的社会基金，等等。經過这样一些扣除以后，余下来的才形成整个社会的积累基金。

可見，积累基金的数量，不是随意規定的，它是有客观依据的。我們計算积累基金的数量，应当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先从国民收入中扣除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所創造的那部分价值，再从余下来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中扣除应当扣除的部分。这样，就可以知道，国民收入中究竟能够提供多少积累。計算积累率，用积累基金的数量同国民收入的数量相比，这种計算方法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計算，必須以經過上述各种扣除以后的积累数量为基础。不从已有的积累数量出发，只是把积累率規定为百分之二十或者百分之三十，很难断定积累的高低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如果积累基金的数量多，积累率是百分之三十也許不算高；如果积累基金的数量少，百分之二十也可能就过高了。因此，不能抽象地評定积累率的高低，主要是看积累率是不是建立在客观实际可能的基础上。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数量的大小，基本上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因素決定的：

第一，决定于国民收入的多少，而在国民收入中，又决定于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量的多少。国民收入和劳动者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量增加得愈快，积累增长的速度也愈快。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体现为剩余价值，

它完全被资本家所无偿占有。在那里，各个企业的资本家虽然想尽办法扩大剩余价值的剝削，但是，由于存在着生产社会性和資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間的对抗性矛盾，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工人大批失业，周期性地爆发經濟危机，国民收入和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量的增长，是經常遇到障碍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已經不再体现为剩余价值，它完全属于全民所有或者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第一次开辟了劳动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和积极性的广阔天地，由于国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发展，永远地消灭了失业和經濟危机。这样，国民收入就有可能比較快地增长，虽然用于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一部分价值是不断增加的，但整个社会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还是比資本主义社会的增长速度高得多。

第二，决定于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当中，消費基金（包括社会消費基金和用于提高現有的劳动者生活水平的那部分基金）和积累基金各占多大的比重。假定剩余劳动所創造的价值数量不变，在这部分价值中消費基金的比重增大，积累基金的比重就会縮小，反过来积累基金的比重增大，消費基金的比重就会縮小。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消費基金的各个部分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一般說来，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保健方面的費用，会高于資本主义社会，而且是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逐步增长的；为丧失劳动者所設立的社会基金也会高于資本主义社会（在那里只有微薄的救济費）；国家管



理費用和国防費用則比資本主義國家低。在社會主義社會，儘管科學、教育、文化、藝術、保健等方面的社會消費基金比資本主義社會高，而且隨着生產的發展，勞動人民的個人收入是逐步增長的，但是，積累的比率仍然可以高於資本主義社會。這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比起資本主義社會來，可以更多地節約非生產費用，已經不存在剝削階級和它的奴仆們的寄生消費。而這部分消費，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大得驚人的。有人統計，在美國，國民收入中用於剝削階級寄生消費的部分竟達百分之二十！

總之，從一般發展趨勢來看，社會主義社會的積累量的增長速度要比資本主義國家快，積累的比率也比資本主義國家高。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性的具體表現之一。但是，就我國的目前情況來看，由於過去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每年新增的國民收入總量還低於某些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今天的積累的絕對量還是比某些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要少。因此，我們今天安排積累，一方面，要看到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巨大優越性，並且要充分發揮這種優越性，克勤克儉，使可能用之於積累的资金，統統利用起來，以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國今天還沒有擺脫“一窮二白”的狀況，底子還不厚，必須根據現有的客觀條件，合理地安排積累的数量。目前我國的農業生產主要的還是靠手工勞動，受自然條件的影響很大，農業有豐收的年头，也有歉收的年头，農業的豐收和歉收，會直接影響工業生產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積累增長的速度。這

樣，在具體地安排積累增長速度的時候，哪一年高一點，哪一年低一點；哪些地區高一點，哪些地區低一點，就應當實事求是地進行精密的計算，按照以豐補歉、瞻前顧后的原則慎重地處理，絕不能刻板地按照一種比率辦事。

積累，這是关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情，確定積累的数量，必須同時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同志在談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分配時，曾經說：“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對於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个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係，必須處理適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儘可能使農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①這個原則，也適用於整個國家的積累基金的安排。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須以生產的不斷增長和積累的不斷增加為前提，發展生產是改善生活的物質基礎。但是，如果生產增長了，不使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相應地有所改善，只片面地注意增加積累，也是不對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在生產發展水平不是很高的情況下，積累不能增加得過快，過快了，就有可能影響消費基金的增長，這歸根到底是不利於擴大再生產的。這樣，是不是說我們的積累的增長速度很慢了呢？不是。第一，即使積累的增長速度有幾年低一點，有幾年高一點，從長期

^①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頁。



来看，我們的积累增长速度还是比資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第二，把积累的增加放在生产发展和劳动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础上，更有利于調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看起来，积累的增长速度虽然慢了一点，实际上会增长得更快。

二

前面我們考察的是积累的货币形态，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积累資金必須轉化为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等物质形态，使資金和物資达到平衡。

不論什么社会，扩大再生产都是以简单再生产为基础的，只有当社会总产品在維持简单再生产以外，能够提供多余的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时候，扩大再生产才有实际上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不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規律。在資本主义社会，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占統治地位，資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經常被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所打断，資本的分配和社会产品的实现，是根本不可能有計劃地进行的。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国民經济的有計劃、按比例发展，我們已經有可能比較准确地計算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有多大的能力，并且自觉地安排資金和物資之間的平衡。

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是可以計算的。假定整个社会产品的价值不变，劳动力的数量也不变，維持简单再生产必須具备下面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是，社会总产品当中，有足够

数量的生产資料，补偿当年的生产資料的消耗。这些生产資料包括：

第一，对已經消耗完了的机器、厂房、矿井、铁路、車輛、役畜、农具等（即固定資產）的补偿部分。机器等等有一定的平均寿命（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不等），当它們消耗完了的时候就要全部更新。从一个企业、一个公社来看，它們的更新时间可能很不一致，但是，从整个国民經济来看，从一个长时期来看，每年总有一定的部分，要按比例地实行替换（例如，全国有几十万台机床，每年总有几万台要替换）。

第二，机器設備当中的周期地或部分地被消耗的部件和零件。这种替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替换机器設備当中种类相同、使用時間长短不等的部件和零件，例如，車站附近的軌道磨損得快，更換得也要快一些，远离車站的軌道磨損得慢，更換得也要慢一些。另一种，是替换机器設備当中种类不同、使用時間也长短不等的部件和零件，例如，紡紗机上的罗拉，可以用十五年左右，錠子可以用十二年左右，鋼領用六天左右。机器上容易磨損的部件和零件，看起来在整个机器設備当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它的作用却不能以比重大小来計量。由于固定資產的特点是全部参加生产过程，必須經常保持它剛剛加入生产过程时候的完整的独立的形态，一个零件替换不及，往往会影响整个机器設備的运轉。因此，为了保持生产的正常进行，必須根据部件和零件的磨損程度，按比例地加以替换。

第三，工业生产上的原料、輔助材料、



燃料；农业生产上的种子、饲料、肥料；对机器设备进行维修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等等，它们经过一个生产周期，也必须在物质形态上进行补偿。

总之，社会总产品中必须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按比例地补偿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已经消耗了的生产资料。消耗多少，就要补偿多少。生产资料是第一部类生产的，第一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在本部类内部就得到了补偿。例如，煤炭企业供给钢铁企业以煤炭，钢铁企业供给机械制造企业以钢铁，机械制造企业供给煤炭企业、钢铁企业以机械，等等。第二部类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它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了的生产资料则必须由第一部类来供给。例如，机械制造企业要供给农业所必需的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其他农业机械，要供给轻工业所必需的机械设各；煤炭企业要供给农业和轻工业所必需的燃料，等等。这样，就要求在两大部类之间按比例地分配生产资料。根据简单再生产的要求，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所供应的全部产品，必须和第一部类本身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已经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相等。

另外一个条件是，社会总产品中，有足够数量的生活资料，供给当年的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和其他社会成员消费的需要。供给整个社会成员需要的生活资料，既包括供给生产劳动者（工人、农民、技术人员）及其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包括供给非生产劳动者（科学、文化、艺术工作人员、国家管理人員和其他非生产人員）及其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两方面的需要虽然会经常发

生变化，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它总有一个一定的水平。维持这样一个水平，是实现简单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谈到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有些文章只提生产的消费（已经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补偿），而不提个人消费，这是不全面的。马克思在分析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和个别企业的再生产的区别时曾经指出，整个社会再生产“这个总过程，包含生产的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及其媒介的形态变化（从物质方面考察，便是交换），也包含个人的消费，及其媒介的形态变化或交换。”^①个人消费看起来是在生产过程以外进行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来看，这种消费本身就是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生活资料是由第二部类生产的，第二部类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本部类内部就得到了补偿。例如，农业供给轻工业以粮食和副食品，轻工业供给农业以日用工业品等等。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这个部类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则必须由第二部类来供给。例如，农业供给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以粮食和副食品，轻工业供给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以日用工业品，等等。这样，也就要求在两大部类之间，按比例地分配生活资料。根据简单再生产的要求，第二部类所供应的全部产品，必须和第一部类、第二部类

^①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28页。



的生产劳动者及其家庭和整个社会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相等。

从以上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出，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哪个部类也不能孤立地发展。自觉地安排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是计划经济的根本要求。为了使第一部类所供应的全部产品和第一部类本身以及第二部类已经消耗了的生产资料能够平衡，计划工作部门首先要依靠精确的调查统计工作，计算出第一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有多大的生产能力（例如，煤和钢有多大的生产能力，机械有多大的生产能力，整个第一部类综合的生产能力有多大），同时，要计算出每一年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生产资料的消耗数量。然后，进行反复比较，使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生产资料的消费达到平衡。对于第二部类也是一样，为了使第二部类所供应的全部产品和第一部类第二部类的生产劳动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能够平衡，也必须精确地计算第二部类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例如，能生产多少粮食、棉花，能生产多少日用工业品），同时，要计算出整个社会生活资料的消耗数量。然后，进行反复比较，使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消费达到平衡。上述两种平衡，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最起码的条件，破坏了这个条件，整个社会就不能继续保持现有的生产规模。

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是社会生产最概括的分类方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两大部类又包括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等三个部门。重工业也生产一部分生活资料，而且随

着化学工业、冶金工业的发展，重工业中生产生活资料的比重有日益增加的趋势，但是，它的主要部分还是生产生产资料，应该属于第一部类。轻工业也生产一部分生产资料，但是，它的主要部分还是生产生活资料，应该属于第二部类。农业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直接生产生活资料，如生产粮食和副食品等；一种是为工业生产生产资料，如生产棉花、油料等，但这些产品仍然要变为生活资料；一种是生产直接用于农业生产和用于第一部类的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如生产种子、饲料和重工业部门所必需的辅助材料等。按照这三种情况，农业应当同时属于两个部类，但主要部分还是属于第二部类。因此，在再生产过程中，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从基本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如果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为了维持再生产的原有规模，重工业除了补偿本部门生产资料消耗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以外，就应当供给农业、轻工业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同时，农业和轻工业除了补偿本部门现有劳动者及其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外，就应当供给重工业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不可能维持整个社会原有的生产规模，自然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了。

简单再生产，实际上指的是维持上一年的生产规模。假定社会总产品中已经提供了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要消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后，就可以计算得出，整个社会究竟有



多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能够用于扩大再生产。前面我们分析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的时候，是假定积累的货币形态和实物形态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两者往往并不完全相等。就是说，资金和物资可能出现某种不平衡。因此，在确定积累规模的时候，必须仔细地计算资金的数量和物资的数量，使资金和物资达到平衡。订计划，不能只看资金有多少，主要看社会总产品中，除去维持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简单再生产和其他社会需要以外，还余下多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可以用在扩大再生产方面。有多少多余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安排多大的积累规模。积累基金归根到底要用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用于基本建设和为扩大再生产而增加现有企业的生产设备、原料和材料，即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另一个方面，则以劳动报酬的形式支付给新增加的劳动者，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资金和物资之间的平衡，就是要求用于基本建设和为扩大再生产而增加现有企业的生产设备、原料和材料的资金和第一部类多余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相等；用于支付给新增加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第二部类多余出来的生活资料的数量相等。这种相等，不能只是价值上相等，而且要求产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在品种、规格方面符合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拿生产资料来说，它有成千上万的品种和规格，必须质量符合要求，品种、规格齐全，成龙配套，才能进行生产。一个工厂，只有主机，没有辅机，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一台机器的制造，有时候缺少

一个配件，也不能成为成品。机器不成为成品，不仅不是扩大再生产，而且会给社会造成浪费。因此，用于基本建设和增加现有企业的生产设备、原料和材料的一部分资金究竟安排多少，还必须注意生产资料在品种、规格方面的综合平衡。

积累基金是不是全部用于当年的扩大再生产呢？不是。积累基金的大部分是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但是，必需留有必要的后备。一个个体农户，也要讲究“耕三余一”，一个国家当然更需要积蓄为防备遭受意外（例如歉收）和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所必需的后备基金。我们常常讲，作计划要瞻前顾后，就是说，不要在当年把积累统统用在生产上去，而是要有长期打算，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能够均衡地增加，要留有后备。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生产持续地、稳步地扩大。

三

扩大再生产，必须正确地安排生产和基本建设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时候把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比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是就其基本的内在联系来看的，实际上，这样相比并不完全确切。简单再生产固然主要依靠原有企业的生产，但是，也需要进行基本建设。例如，煤矿的矿井每年总有一部分开采完了，要有新矿井代替，这一部分新矿井的基本建设，仅仅是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并不属于扩大再生产的范围；森林采伐也是一样，每年总有一部分老林区



采伐完了，要有新林区代替，这一部分为开发新林区而进行的基本建设，也仅仅是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并不属于扩大再生产的范围。扩大再生产，从长远来看，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基本建设。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旧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抗日战争以前，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在工业中，百分之七十是轻工业，重工业不到百分之三十。因此，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三年大跃进期间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基本建设，这样做是很必要的。在这个期间，我们不仅大大加强了原有的工业部门，而且开始建设了过去没有过的许多工业部门，如冶金设备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等等，使工业生产的面貌起了巨大的变化。今后，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也仍然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基本建设。但是，增加基本建设，必须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为基础。首先，进行基本建设，就需要增加劳动力，劳动力增多了，就要相应地增加生活资料的供应。如果生产技术水平比较高，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比较快，工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有一部分转移到基本建设部门，生活资料的供应相对的说，也会增加得少一些。而在生产技术水平比较低，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比较慢的情况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的是来自农业方面。因此，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看农业方面能提供多少劳动力，提供多少粮食和各种副食品

(建设轻工业还要看能提供多少生产资料)。其次，要进行基本建设，还需要增加生产资料，需要增加成套的设备，这些设备是重工业部门生产的。因此，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小，还必须看工业方面在维持现有企业的生产以外能够提供多少生产资料。生产，是基本建设的前提。我们只能在保证原有企业能够进行正常生产、并且尽可能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根据需求和可能安排基本建设的规模，绝不能脱离工农业生产的基础，孤立地安排基本建设。

从长远来看，要扩大再生产，没有基本建设是不行的。但是，就每一年来说，扩大再生产很大部分并不是依靠基本建设，而是依靠挖掘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因为新建企业当年投入生产的总是少数，而且即使投入生产，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也需要有一个时间。马克思说过：“有多种事业，它们会在长期内取去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但不会在这期间内提供任何有效用的生产物。有多种事业，则不仅在一年间，继续地或多次地，取去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且也同样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化生产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决定前一类事业应以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害于后一类。”^①如果把前一类事业看做是基本建设（这一类事业不完全是基本建设），在这里，一项工程往往要进行几年、十几年，在这个期间，它们只是占用劳动力（相应的要占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并不向社会提供产品；如果把后一类事业看做是现

^①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36页。



有企业的生产（这一类事业也不完全是现有企业的生产），它在当年就可以一次或者多次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消耗转化为产品。为了使两者比例恰当，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我们在分配资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时候，就应该先满足现有企业的生产的需要，然后再安排基本建设。就是说，必须是先生产，后基建，而不是相反。生产，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由于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分配资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时候，必须首先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然后再安排工业生产。在工业生产中，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分配资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时候，必须根据农业所提供的原料的情况首先满足供给市场需要的轻工业（包括手工业）生产的需要，然后再安排重工业。

把农业、轻工业排在前面，是不是就不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了呢？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绝不是孤立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的发展，要依靠农业提供粮食、劳动力和一部分积累，要依靠广阔的农民市场，农业不发展，重工业是不可能发展得很快的。同时，重工业的发展，也要依靠轻工业供应市场更多的生活资料，满足广大人民吃、穿、用等方面的需要。没有日益增多的轻工业品供给市场的需要，不但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会影响从农村换取更多的为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农产品，影响国家积累，影响国内市场的扩大。毛泽东同志说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

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①由此可见，先安排农业；轻工业，再根据需求和可能安排重工业，并不是不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了，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放在一个切实可靠的巩固基础上。

有些同志把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等同起来，认为不增加基本建设，或者基本建设的规模小一点，就不能扩大再生产，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实际上扩大再生产并不是一定要增加基本建设。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不增加基本建设，只要认真挖掘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现有的不少企业的生产潜力是很大的），也可以使生产进一步扩大。挖掘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方法是很多的，例如，提高劳动者的觉悟水平和技术水平；改善劳动组织；加强生产、财务、技术管理工作；提高现有的设备的利用率；进行有成效的技术革新，等等。只要把这些工作做到了，做好了，就可以使生产大大地增长。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是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通过实践，进一步深入地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自觉地安排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平衡，促使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页。



不違农时是领导农业

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

· 章 竟 ·

不違农时，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傳統經驗，也是我們党和国家领导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不違农时，就是說，要保证农业生产中的各項工作按照农事季节进行，不能过早或过晚；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要适应农事季节的需要，积极为农业生产服务，决不能妨碍农业生产，当这些工作与农业生产发生矛盾时，应该主动地为农业生产让路。认真地贯彻执行这项政策，无疑是实现农业增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不違农时，这是由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产生的客观要求。农业生产同其他生产一样，都是人类改造自然、向自然界索取物质财富的斗争。但是，同其他生产比起来，农业生产与自然的关系最密切，最直接，最广泛；农业生产的过程，受着自然条件的强烈影响，带着很大程度的自然性质。正如馬克思曾經指出的：“經濟的再生产过程，無論其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总会在这个范围（农业）内，与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錯着。”^①农作物是有生命的东西，不同作物、不同品种所需要的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各有各的耕、种、管、收的时宜。农业生产的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农业劳动具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强烈的季节性和時間性，农业生产过程中

的一切工作和措施，都必须根据季节、时令，根据作物所需要的气候条件，及时地进行，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过早或过晚，都要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馬克思說：“有許多生产部門，在其中，往往必須在一定的期限內，获得一定的劳动結果。这种紧急的时期，是由劳动过程自身的性质規定的。譬如一群羊剪毛的工作，又如若干亩田割麦的工作。这一类工作的生产物的分量和品质，要依存于这一件事：工作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开始，在一定的時間終了。在这場合，劳动过程所必須采取的时期，像青魚的漁期一样是預先規定了的。”^②天时条件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影响农作物吸收土壤肥力的程度，促进着或阻碍着农作物病虫害的发展。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农作物的产量是由天时条件和农业技术水平来决定的；而如果农业技术不变，那末产量的多寡就是由天时条件和人們对天时条件的运用来决定。

我們的祖先，很早就認識到天时条件与

①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39頁。

②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2頁。



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懂得掌握农时的重要性。古农书中說，“四时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則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莠，則失之太晚而不成。”^①“順天时，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②由于不違农时是生产的客观要求，是发展农业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所以历来被一些“明当世之务”的政治家視为一項重要的“富国裕民”之道。孟子說：“不違农时，谷不可胜食也”^③。荀子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④他并把“无夺农时”作为一項富国的要策。^⑤

天时条件，即風霜雨雪寒暖等等的演变，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轉移的。我們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农业生产水平，比过去是大大提高了，我們已經有了更多的改造自然的能力。随着我們对自然环境的逐步改造，例如进行大規模的植树造林、水利建設等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局部地改变大地的气候条件。在农田中修建風障、阳畦等設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土壤温度和地表空气层的小气候条件，使其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修建温室，更能够人工地为农作物的生长創造适宜的气候条件。运用現代科学技术进行的人工降雨、积雪融化等等的試驗研究，也是局部地改变气候条件的可能的途徑。但是，整个說来，我們在农业生产中还不能控制自然，控制气候，还不得不依賴于大自然的气候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适应和利用天时条件，适时耕作，不違农时，还是决定农业生产效果大小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圣人能輔时，不能違时。”对我們來說，“輔时”就是适应和利用天时演变的客观規律。要在生产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做到“爭天时”，“夺地利”，就必须順时而作，而不能違时而行。这几年連續的自然災害，給我們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一些困难，但也促使我們許多领导农业生产的同志，更深刻地認識到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强烈影响，懂得需要更好地学会适应天时条件的变化来开展生产活动和战胜災害的本領。有的地方的某些同志，不重視农时，不按照天时演变的規律办事，甚至錯誤地提出“打破旧皇历，創造新农时”的口号，随便改变播种期，不顾实际情况机械規定农活的开始和完成的时间等等，結果給生产造成严重的損失。所以，决不能以为我們有了些改造自然的能力，就輕視自然規律，違背农时，如果那样，不仅不能“爭天时”，“夺地利”，而且必然要受到“天时”的懲罰，喪失地利。

恩格斯說：“我們統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我們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仅仅是因为我們胜于其他一切动物，能够認識和正确运用自然規律而已。”^⑥在农业生产

- ① 《授时通考》，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11 頁。
- ② 《齐民要术疏證本》，农业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7 頁。
- ③ 《孟子譯注》，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5 頁。
- ④ 《王制篇》。《荀子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7 頁。
- ⑤ 參見《富国篇》。《荀子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5 頁。
- ⑥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46 頁。



中認識和运用自然規律，首先就是要通过学习农民群众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掌握农时的丰富經驗；認識天时演变的規律，学会运用这种規律适时地开展农事活动。只有各項农事活动切合时宜，不違农时，才能在生产中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达到多种、高产、多收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們要把不違农时作为一項重要的农业政策来貫徹执行的最根本的原因。

* * *

在一九四二年，毛澤东同志在总结陝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經驗时，就把不違农时作为一項重要的农业政策提出。他說：“我們的第四項农业政策就是不違农时，即在农忙时允許农民停止一切无关农业的开会与动員。在陝甘宁边区环境內，农忙时期應該停止农民群众除农业以外的任何开会与动員，借以节省人力畜力，使之全部用到农业生产上去。必要的开会与动員，应当利用农隙。”^①这一政策，反映了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广大农民的要求，确定了农业生产在农村工作中的首要的中心的地位，为解决农村中其他工作与农业生产的矛盾，提供了正确的指針。

凡是开展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作，都必须注意农事季节，不違农时，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一九四二年毛澤东同志在談到粮草运输問題时曾指出：“必須依靠人民运输的粮食，应早計劃，利用农暇或空脚牲口运输。非特殊情形，不准在农忙时間动員运输。”^②一九四五年，毛澤东同志在談到如何争取农业生产运动的胜利时又指出：“不違农时，减少誤工，也十分重要。現在一面要

为战争动員民力，一面又要尽可能地不違农时，应当研究調节的办法。”^③一九四八年，毛澤东同志又把“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員，减少开会时間，注意农业的季节，不違农时”^④作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經濟困难的一个重要办法提出。

党的不違农时的政策，不仅要求各級組織和各个部門不要因为其他工作的进行而耽誤农业生产，而且要求在农忙时从各方面組織人力参加农业劳动，帮助农民完成生产任务。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曾經提出：“当农忙时，边区軍队一律就駐地附近替农民耕种若干天，鋤草若干天，收割若干天，而不收受任何的报酬(吃自己飯)”^⑤。并提出学校放生产假的办法：农忙时，农村的小学、中学必須停課，让学生及本地教員回家帮助生产。

党的不違农时政策的切实貫徹执行，是在軍事斗争极为緊張的战争年代，解放区的农业生产能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农村党政机关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組織和领导农业生产，同广大农民一道，为增产更多的农产品而斗争。这就要求我們各級干部更好地貫徹执行不違农时的政策。还应该看到，农村中各个部門都有它們自己的具体任务，它們的工作

①② 《經濟問題与財政問題》，解放社1944年版，第39、236頁。

③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70頁。

④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會議的通知》。《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51頁。

⑤ 《經濟問題与財政問題》，解放社1944年版，第43頁。



都与农民、与农业生产直接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处理得好，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处理不好，注意不够，各个部門就容易片面強調本部門工作的重要性或特殊性，忽視农业生产是农村的中心任务，因为本部門工作的进行而違誤农时，因而与农业生产发生矛盾，妨碍生产。因此，根据党的不違农时的政策，正确地处理农村其他工作与农业生产之間可能产生的种种矛盾，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問題。

发展农业生产是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也就应当成为农村党政机关的工作中心。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更是农村一切建設工作发展的基础。工作脫离生产，就会在政治上脫离群众；因为其他工作的进行而耽誤农业生产，就会使其他工作丧失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农村中的其他工作，包括工业交通工作，財政貿易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政机关的工作，各种群众团体的工作，都是圍繞着发展农业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并为这个中心任务服务的，因此，都必须服从农业生产的需要，做好部門工作，以自己的业务支援农业，而决不能相反。各个部門在农村举办各种事业，必須严格控制，办哪些，办多少，都要从有利于农业生产出发；并且必須深刻了解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在不誤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不办，决不能事事強調专业化，經常占用一大批人力、畜力、物力，事事限期完成，影响甚至挤掉农事活动时间。在农忙期間，农村中應該停止一切妨碍生产的會議，也不要任意抽調基层干部到上面来开会或进訓練班，以免違誤农时。經驗证明，在农忙季节停止一切

妨碍生产的會議和动員，把有碍生产的其他工作减少、推迟甚至取消，实在不能推迟或取消的必須結合生产来进行，这样做，其最后的结果，并不是妨碍这些工作的开展，而恰恰是为它們的不断前进和順利发展准备条件。因为只有农业增了产，物力、財力才能充足，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政治热情才能提高，举办其他事业和进行其他活动才会既有較好的物质条件，又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以，这样做，看起来其他工作的进展似乎慢些，其实并不会慢，反而会快些，是真正的快。

因此，應該說，根据党的不違农时的政策来正确处理农村其他工作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和矛盾，不单是为保证农业的发展所必需的，也是为保证整个农村工作和整个建設事业的发展所必需的。认真地貫徹执行不違农时的政策，不单是农业部門的責任，也是各个部門、全党全民共同的責任。

* * *

为了保证不違农时，促进农业增产，除了需要經常注意調节农村其他工作与农业生产的矛盾，使其他工作主动为农业生产服务、給农业生产让路以外，就农业本身的领导來說，也还有些問題值得注意和研究。根据历年来的經驗，主要是：要深入地研究当地农业生产的特点，改进对生产的领导方法；保证生产第一綫有足够的劳动力；一切耕作措施的采用，都要以不違农时为原则；生产的准备工作特别是生产資料的准备和供应工作，要走在农时的前面；要向困难处打算，多准备几套克服困难的办法，根据天时



变化，随机应变。

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不一样，农事季节也各不相同，具体农时的差异就更大。这就决定了，在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农时的差别性和复杂性，不能千篇一律，用简单的行政命令办事；需要尊重基层生产单位在安排和指挥农事活动方面的自主权，不能管得过多过死。干部领导生产的主要职责，应该是通过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调动广大群众和基层生产单位的生产积极性，通过调查研究 and 典型试验，帮助下解决生产关键问题；而不是对下面的农活安排和生产措施等等进行不必要的干涉，更不准瞎指挥。有的社员说得好：“种庄稼要看节令，不能等命令。”农业生产的工序，也是一环套一环的，常常是：一处打乱，处处受牵连，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指挥下面的农事活动，就不可能照顾到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农时的差别性和复杂性，就不可能符合生产的实际需要，因此，也就很容易打乱农业生产的正常的工序和基层生产单位的农事日程安排，造成违误农时。

应该看到，经过千百年的生产实践，各地农民对于如何使耕、种、管、收等农活安排适合时宜，都有一套传统的经验和习惯。一般说来，他们的经验和习惯是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相适应的。只要善于尊重他们的经验，不随便打破或打乱他们对农活的日程安排，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可能做到使生产上的各个环节都切合时宜。农民群众掌握农时的某些经验和习惯，如果由于条件有了变化，确实需要加

以改进或改革，在改革时，也需要十分慎重。应该经过群众讨论，根据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先作典型试验，确实成功后，再根据群众的自愿，逐步推广，决不允许主观主义地进行这种改革，或者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就贸然推广，以免违误农时，给生产带来损失。

党的不违农时的政策，要求我们对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对当地农业生产的特点，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更好地改进领导方法，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多下工夫，做认真的努力。

使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是保证农事活动不违农时的头等要素。特别在农忙季节，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工作，这时劳动者的人数更具有决定的意义。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时间的短，可以由紧急时期投在生产场所内劳动量的大，补救起来。在这场合，不错过时间的结果，有赖于多数结合劳动日的同时的利用，效果的大小，则依存于劳动者人数。”^①根据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为了保证不违农时，在农忙季节，必须使农村整半劳动力集中用于农业生产第一线。在夏收夏种、秋收秋种等大忙季节，有些机关、部队还需要抽出部分人员参加一定时期的劳动。农村的中、小学，仍应当实行放农忙假的制度。农业中学要实行农忙劳动，农闲开学的办法。总之，要使用于田间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足以适应农忙季节抢种抢收等紧急工作的需要。就是在非农忙季节，也要保证积肥等生产活动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2页。



所必需的劳动力。

因时制宜地采用各种耕作措施，也是保证不違农时的一个重要环节。任何耕作措施，只有运用得适合时宜，才能收到增产的效果。例如，种植某种高产作物可以增产，但如果种得过多，就会使耕、种、管、收各项农活过于集中，在现阶段基本上还是靠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就容易因忙不过来而違誤农时，給生产带来损失。水稻合理密植可以增产，但密植要多用工，如果密植与搶季节发生矛盾，使插秧时间拖长，不利于搶季节的时候，一般說，与其因孤密植而耽誤季节，就不如让密度服从季节。耕作制度的改革也是如此。在劳动力充足，气候等其他条件也具备的地方，适当提高复种指数，例如把单季稻改为双季稻，有利于增加产量。如果在劳动力不足或者气候条件不适宜的地方也随便改，就容易在早稻收割和晚稻插秧期間違誤农时，以至作物不能正常生长成熟，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因此，采用一切耕作措施，都必须因时因地制宜，以适合当地条件和不違农时为原則。

“力田之資，必先于利器。”在农忙季节到来以前，及早把必需的生产資料准备齐全，不仅数量足，而且质量好，这是提高劳动效率、耕作不誤农时的物质保证。“闲时置下忙时用，莫到临渴再掘井”，这是我国农民的固有經驗。生产資料的准备，应该是冬为春，春为夏，夏为秋，只能叫生产資料等节令，不能叫节令等生产資料。不仅要一般的、風調雨順时所需要的物质准备，而且要做特殊的、应付各种自然灾害的物质准备。有准备，才有工作的主动权。許多生产資料是靠工业、商

业、供銷部門供应的，这就需要这些部門的同志能够以农时为重，使自己的工作与农事季节的需要相适应，使生产資料的供应走在农事季节的前面，而不要落在它的后面。

風雨不調，旱涝成災，是农业生产經常遇到的困难，也是常常造成違誤农时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我們根据党一向提倡的“向坏处打算，向好处爭取”的精神，多設想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多掌握一些克服困难的办法。这样，就不致在遇到自然灾害时束手无策，陷于被动。各地的农民群众，都有許多抗御自然灾害、根据天时条件随机应变的生产經驗。例如，在易旱、易涝的地方，选择种植耐旱、耐涝的作物或品种；在作物的种植安排上避开易于发生水旱灾害的季节；在稻田水源不足、遭受干旱的情况下，及时改种旱作物，等等。农民的这些經驗，大都是在过去的个体經濟条件下形成的，現在我們有集体經濟的优越条件，应该更好地运用和发展这些經驗。只要我們善于同群众商量，特别是向富有生产經驗的老农請教，就能够找到对付各种災情的有效办法，做到不誤或少誤农时，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爭取較好的收成。

* * *

現在隆冬已过，大地春回，春耕农忙季节已經到来。“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时有成。”就是說，一年之計在于春，春季抓紧农时，及时耕作，将为以后各季和全年生产打下良好基础。显然，在这时候，认真地宣傳和貫徹执行党和国家的不違农时的政策，就更加重要。



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 林 一 舟 ·

一个革命者，一定要有远大的奋斗目标，看到光明的前途，树雄心，立壮志，有实现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如果胸无壮志，就不会有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坚强的革命毅力。但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实现革命理想，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一点一滴地做好当前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具体问题。毛泽东同志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①我们一定要把雄心壮志和踏实苦干结合起来，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才能把革命理想变为现实。

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措施。这是扎扎实实做好工作的第一步的要求。就如修建高楼必须首先勘察地基、打好基础一样，如果地基没有勘察清楚，基础没有打好，上面的砖瓦垒得再好，这座楼房也不会巩固。我们在革命和建设当中每前进一步，都必须脚踏实地，才能快步前进。如果没有摸清现实情况，两脚没有踏在实地上，对于现实情况做了过低或者过高的估计，就不可能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措施，也就不能顺利前进。毛

泽东同志在谈到军事斗争的时候曾经说过：“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②在建设时期进行工作也是这样，必须恰如其分地了解实际情况，把根扎在实实在在的基础上，才能掌握主动权，才能取得工作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除了进行各项工作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以外，每项工作还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对于不同战线、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同志来说，决不是只懂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几条普遍规律就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还需要真正摸清自己所担负的工作的特殊规律。这不是别人所能够代替的，不是坐在房子里可以想出来的，也不是走马观花地看看表面现象就能够真正懂得的，而必须深入到工作当中，切切实实地下苦工夫。进行工作，就是要不断地解决矛盾，

①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66页。

②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03页。



而矛盾都是具体的，必須深入到事物里面，一个一个地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使一个一个的矛盾得到解决。毛澤东同志說：“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問題、解决糾紛、处理工作、指揮战争）。这样的做法，沒有不出乱子的。”他又說：“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我們必須时刻記得列宁的話：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①要深入地了解具体情况，对于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摸清每一項工作的具体規律，沒有扎扎实实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問題要一个一个地去了解，还要一个一个地去动手解决。工作要一件一件地摸清情况，还要一点一滴地去做。建設社会主义的偉大事业，是由許許多多的具体工作組成的。任何一項工作的成就，又都是由一点一滴的成績积累起来的，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問題的結果。一件具体工作沒有做好，一个具体问题沒有解决，就可能影响到工作的全局。一座高樓缺一磚一木，就会影响它的巩固，一架机器缺一个螺絲釘就不能准确運轉甚至不能开动。有些工作看来是很細小的，然而，如果忽視它，不屑去做，或者不采取認真的态度，不願在这些細小的工作上下工夫，就不会有大的成就。列宁曾經說过：“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須从小事做起。”他又說：“另一方面，‘大事业’成功之后，推翻資本家私有制并把政权交給无产阶级的政治变革实现之后，要在新基础上建設經濟生活，又只能

从一点一滴做起。”^②一点一滴地、扎扎实实地做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把每一件工作都做得实实在在，經得起時間的檢驗，經得起風浪的吹打，就是为我們的偉大事业做出了可貴的貢獻，就为繼續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真正了解情况，切实解决問題，取得任何一項成就，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奏效的，而必須依靠經常的細致的工作。有了經常的細致的工作，了解情况才能逐步深入，逐步接近于客观实际。客观規律是能够被認識和掌握的，但又不是很容易認識和掌握的，必須依靠长期的反复的实践，一步一步地提高認識，在經常工作中一点一点地积累經驗。而且，客观情况总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必須經常地注意了解，否則，認識就会落后于客观实际。許多小問題、小缺点积累起来，就会成为大問題、大缺点，給工作增加更多的困难，甚至造成損失。有了經常的深入細致的工作，及时地總結和推广經驗，及时地解决問題、糾正缺点、克服困难，就能使我們的工作更順利、更健康地向前发展。有些工作，是需要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有些工作是需要临时突击的，但是，群众运动，突击工作，也必須以經常的深入細致的工作做基础。有的同志，有的单位，不注意建立經常工作，不注意在經常工作中积累經驗，联系群众，而只热衷于突击工作，以为

① 《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1、305頁。

②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創造新制度》。《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5頁。



只靠突击性的群众运动就可以把事情办好。实际上，如果没有经常工作，不把经常工作做好，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突击工作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我们党过去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开展了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够搞得那样好，就是广大干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的工作的结果。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并不需要多少时间。而要把群众大会开好，把地主彻底斗倒，事前却需要用很长的时间调查情况，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队伍。经过这样深入细致、一点一滴的工作，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才取得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效果。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组织互助组一直到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则是经过了更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工作的结果。在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扬这种优良作风，扎扎实实地做好经常工作。

先做典型试验，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广，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工作，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工作方法。在土地改革中，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过程中，我们党坚持了这种工作方法，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经验证明，这是把工作做得更加扎实的正确方法。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复指出：“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①。在建设时期，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应当这样。凡是沒有把握的、沒有成熟经验的事情，都应当先经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对于原定的计划加以补充修正，做好准备，然后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这样就能够更大的范围内把工作

做得更好。从教育和发动群众方面来说，由于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最相信自己看到的、亲身体到的东西，因此，做出活的榜样给群众看，是最有说服力的。列宁在谈到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的时候曾经说：“农民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因此他说：“要实际地说服农民。农民不会相信空话，他们这样做是很对的。要是他们一听到法令和传单的内容就相信，那倒不好了。假使这样可以改造经济生活，这种改造是一钱不值的。”^②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成功的经验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

一点一滴地做工作，一切经过试验，是否太费事、太麻烦了呢？工作会不会进行得太慢呢？当然，我们做一件工作，总是希望少用一些时间和力气，做得快一些，总是希望一帆风顺，不走弯路。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想省事，倒费了事，怕小麻烦，倒引来了大麻烦，想走直路，倒走了弯路，开头看来是快了，结果是慢了；一种是，开头费了工夫，以后就大大省了工夫，开头做了麻烦事，以后就减少了麻烦，开头走了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以后就很顺利了，开头看来是慢了，结果是快了。问题在哪里呢？需要进行具体分析。现实的客观可能性，本来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果我们制定的计划措施低于这种可能性，经

^①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232页。

^②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2、183页。



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事情也认为不能做到，不努力去做，工作就会进行得很慢。相反地，如果我们制定的计划措施超过了现实的可能性，主观上想快一些，也是不可能的。只有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从实际情况出发去做工作，才能做出成绩，才有真正的快。同时，客观事物本来是极为复杂的，进行革命和建设本来是很费事的，是有很多麻烦的，是需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的。如果我们采取简单的方法去处理复杂的事物，怕麻烦，图省事，只想走直路，就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最后还必须回过头来一点一滴地去做那些麻烦事。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①。我们的工作，应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分析去做。还应当看到，凡是有关群众的工作，只有群众行动起来了，群众前进得快了，才是真正的快。列宁曾经说过：“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②我们要一点一滴地去做工作，要一切经过试验，就是要把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使群众自觉自愿地行动起来，这样表面看来似乎是慢，实际是快，而且会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加扎实牢靠。

一点一滴地做工作，表面上似乎并不轰轰烈烈，实际上却能够真正深入地了解情况，深入地发动群众和教育群众，取得切切实实的效果。相反地，只有轰轰烈烈的形式，却

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讲求实效，不图虚名，这是我们应当具有的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一点一滴地做工作，也有些时候并不能很快地看到多么显著的成绩，但是，伟大成绩的取得，只能这样一点一滴地做准备，一点一滴地积累。这样取得的成绩才是巩固的，经得起检验的。

一点一滴地做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完全不同于工作中的事务主义。事务主义的工作方法，一般表现为整天价被琐碎的事务缠身，忽视思想、政治和政策问题；把很多事情平列起来，分不清轻重缓急，分不清主次，没有计划，碰到什么做什么，甚至“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抓不住主要问题，缺乏明确的方向；只知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却不能从个别看到一般，不注意寻找工作中的规律，不能指导一般；事无巨细，自己都包揽起来，不注意组织大家做工作，发挥集体的作用。我们前面谈到的要扎扎实实地做工作，显然是和事务主义完全不同的。在我们的工作中，应当把这两者区别开来。

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③我们要进一步发扬扎扎实实的精神，用辛勤的劳动，一点一滴地做好当前工作，做好经常工作，以逐步到达理想境界。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90页。

^②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8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进 一 步 加 强 成 本 管 理

· 赵少平 ·

加强成本管理，不断降低产品成本，是我国工业企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产品的成本，包括生产产品时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工资和工资附加费用、企业管理费用、车间经费等项费用。降低产品成本，就是要求企业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生产同量的产品时，节约各项费用，耗费更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工业企业降低了产品成本，就能够以同量的原料、材料、燃料和劳动的耗费，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更好地供应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必须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制度。经济核算制度要求企业以销售产品

的收入，弥补生产产品的耗费，并且取得赢利。企业产品成本降低了，以同样的价格销售产品，就可以取得更多的利润，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我国积累的主要部分，是来自国营企业的上缴利润。所以，降低产品成本，还可以为整个社会和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创造有利的条件。如果企业不注意节约，产品成本过高，这个企业所

得到的利润就会很少，甚至会发生入不敷出的亏本现象。企业出现了亏本现象，不但没有为社会创造新的物质财富，而且，还损耗了社会已有的一部分物质财富。这种情况，对整个社会和企业的生产，都是十分不利的。

企业厉行节约，不断地降低产品成本，体现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为企业降低产品成本，提供了客观条件。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职工群众是企业的主人，他们很关心产品成本的降低。社会主义企业，不存在竞争和垄断，技术的发展具有广阔的道路。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企业可以做到节约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同时，一个企业降低产品成本，还能够取得其他部门、其他企业的密切协作。凡此种种，都使企业降低产品成本，具有巨大的可能性。企业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做好工作，变可能性为现实性，以达到不断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

降低产品成本，是一件很复杂很细致的工作，它要求企业必须加强成本管理。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工业企业在成本管理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十分宝贵的，我们必须认真总结，以便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精打细算，将成本管理工作做得更好。

有一种思想认为，只要产量增加了，不必加强成本管理，产品成本会自然降低。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当然，产量增加了，企业有一些费用，例如企业管理费用，不一定相应地增加，因而可能引起产品成本中这方面费用的降低。但是，随着产量的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的消耗也会增加。企业如果只抓生产，不抓成本管理，只顾增加产品产量，不



愿降低各种消耗，产品成本不但不会降低，反而可能提高。如果做好成本管理工作，产品成本就可能降低得更多。因此，越是在产量增加的时候，越要注意降低产品成本的工作。

有的企业在降低产品成本中，不注意保证产品的质量，这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求的降低产品成本，是以保证产品质量为前提的，绝对不是不顾产品质量，为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如果这样做，从一个企业看，在某种情况下，好像是产品成本降低了，但是，结果却使消费者蒙受经济上的损失，给生活带来不便。质量不好的产品，出售给其他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就会影响其他企业的生产，以致给整个社会造成浪费。当然，在保证产品质量同降低产品成本之间，有时是有一定矛盾的，但是，企业在降低产品成本时，也充分重视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工作，企业的产品生产，仍然可以达到成本较低和质量较高的要求。这里重要问题是，要千方百计地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

我们不仅要在生产比较顺利的时候，做好产品成本管理工作，而且，在生产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必须做好产品成本管理工作。企业生产遇到客观困难，的确会影响到产品成本的降低。可是，企业如果加强成本管理，不断挖掘内部增产节约的潜力，不仅可以降低产品成本，而且也有利于企业克服生产上的困难。正是因为生产上有困难，恰恰更需要加强成本管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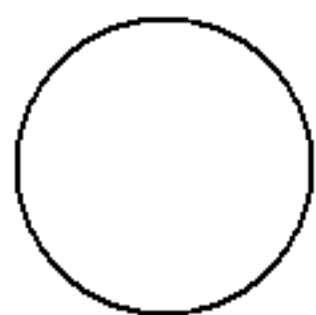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工业企业降低产品成本，不只是一个企业的事情。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企业和企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就要求企业的主管部门，必须根

据需要和可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计划，保证对企业资金和生产资料的按时供应，并且在企业和企业之间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这一些，乃是企业完成降低成本计划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从企业本身来说，为了加强成本管理，首先要正确地制定生产、技术、财务等计划，根据设备、原料和材料的可能条件，安排产品的生产。如果企业的生产计划制定的不切合实际，不但不能降低产品成本，而且可能出现某些原料、材料供应不及，积压大量半成品的现象。这对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企业在加强成本管理中，根据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等项计划，要切实做好成本核算工作。为此，企业应该健全会计制度。马克思说，“个别商品生产者，单是在他的头脑中作簿记”，但是，生产“过程愈采取社会的规模，愈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簿记——当作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就愈成为必要。”^①企业应该健全财务会计机构，保证配备必要数量的专业财务人员，并且不断提高这些人员的业务水平。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人员，必须建立和健全账簿组织和账务手续，按时做好记账、算账、查账和报账的工作；坚决改变账目不全、不实和手续不清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准确的数字资料，将企业的成本核算放在可靠的基础上。

企业有多种多样的费用，各种费用性质不同，资金来源不同。哪些应该计入产品成本，哪些不应该计入产品成本；哪些应该一次计入，哪些应该分期计入，国家都有严格

^①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3、145页。



的規定。為了正確進行成本核算，企業應該嚴格按照國家關於成本開支範圍的規定辦事。一般說來，同產品的生產本身沒有直接關係，和不應該通過產品成本項目進行補償的費用，都不得列入產品成本。例如，企業的基本建設費用、文教費用和企業經營農副業生產的費用，很显然不應當計入產品成本。不是屬於產品成本開支的，也列在產品成本項下來進行補償，人為地擴大產品成本，就會歪曲了產品成本的真實內容，不利於企業產品成本的核算。更重要的是，這樣，就會減少甚至擠掉應當上繳的利潤，從而影響國家有計劃地進行資金的積累和分配。在生產多種產品的企業中，動力費用、企業管理費用等，是各種產品共同支出的。為了保證產品成本的準確，應該按照不同產品的實際耗費和有關規定，來合理地分攤費用，防止簡單地平均分攤。

在正確地進行成本核算的同時，企業應該做好成本計劃和成本分析工作。企業的成本計劃，要按年度、季度、月份分別制定；計劃提出的降低產品成本的指標，要積極可靠。企業在執行成本計劃中，要加強檢查分析工作。企業的廠部和車間，需要經常開展綜合的和專題的成本分析，通過成本分析，發現問題，以便挖掘潛力，規定有力的措施。

在我國大多數工業產品的成本中，原料、材料、燃料等物資消耗，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加強物資管理，節約物資消耗，是降低產品成本的主要方面。在生產中降低物資消耗，必須避免大材小用，優材劣用，並且合理地回用、代用和利用邊角廢料，充分發揮物資的作用。對機器設備，企業應當加強維

護檢修，適當地提高機器設備的利用率，以減少單位產品中的折舊費用。在物資的運轉、貯存方面，大力防止物資的損耗變質和節約有關費用，往往對企業降低產品成本，發生很大的作用。企業應該加強同運輸部門的協作，改進運輸管理，並且在企業內部，認真做好倉庫、料場的保管工作。為了避免物資的積壓浪費，保證物盡其用，企業在采購物資時，從生產和貯備的實際需要出發，結合資源的客觀條件，應該加強計劃性。目前，各工業企業必須認真清查積存物資，以充分發揮物資的潛力。為了加強物資管理，企業在有關的各個環節，要建立和健全一套規章制度，例如領料、退料制度等；做好檢驗、計量、核算、盤點和原始記錄等工作，達到賬實相符，家底清楚。

降低產品成本，還要求企業充分重視節約活勞動。在這方面，最根本的問題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就可以做到消耗同量的勞動，生產更多的產品；或者生產同量的產品，消耗更少的勞動，從而節約產品成本中的工資開支。提高勞動生產率要求企業必須加強勞動管理，充分發揮勞動力的作用。在企業中，人浮於事是一種嚴重的浪費現象，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着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產品成本的降低。所以，企業必須根據生產任務的實際需要，節約使用勞動力，精簡一切不必要的人員，努力降低行政管理人員和服務人員的比重。這樣做，不但可以避免勞動力的浪費，而且也可以節省企業的開支，特別是非生產性費用。在這里，必須反對那種認為人多好辦事的錯誤思想，企業應當爭取以更少的人力，做好更



多的事情。

生产中的物资消耗和劳动消耗的多少，同生产的技术条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生产中，不断地改进技术，是降低产品成本的物质前提。因此，根据需求和可能，企业应该积极地开展技术革新的工作。技术革新和推广先进技术，要采取慎重的方针，在做好反复试验和科学鉴定工作的同时，企业的生产技术人员和财务人员要密切配合，在经济上进行切实的核算，以求真正做到技术上先进和经济上节省。

加强定额管理，是降低产品成本的重要手段。企业应该根据已经达到的水平，按照平均先进的要求，制定和修改各种物资的消耗定额、储备定额、劳动定额和管理费用定额等等。定额确定以后，最重要的是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定额办事，防止超定额的消耗，并且进一步争取定额内的节约。

从上面看来，加强成本管理牵涉到企业许多环节的工作，它不仅仅是企业财务部门的事，也同企业的生产、技术、劳动、供销等部门的工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加强成本管理，要求企业的各个环节，要保证做好有关工作，并且相互之间，要取得密切的配合。同时，这种情况还要求工业企业，必须加强各个专业机构和专职人员的责任制度。有了严格的责任制度，事事有人负责，才能堵塞漏洞、防止浪费，保证产品成本的降低。严格贯彻责任制，在企业领导上和不同部门之间，应该尊重各专职人员的职权。同时，各专职人员也应当坚持原则，敢于负责。例如财务会计人员，对于一切不合制度、不符手续的开支，必须坚决拒绝支付和报销。

对于违反财政纪律的行为，财务会计人员有权越级上告。为了加强责任制度，需要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做到奖罚分明。

广大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他们直接从事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物资和劳动的节约，都要通过他们去实现。因此，企业加强成本管理工作，必须贯彻群众路线，通过深入的细致的工作，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制定成本计划和各项生产定额，要发动群众讨论。降低成本的指标，要落实到车间、工段、小组，有的甚至落实到个人。在专业管理的指导下，班组在核算产量、质量的同时，对物资和工时的消耗，也要进行核算和分析，并且在这方面开展竞赛和评比。

加强成本管理工作，要求企业的全体职工群众，发挥高度的当家做主的责任感，十分爱惜国家财产，坚决反对一切浪费。因此，在切实做好细致的经济工作的同时，需要加强经常性的思想工作。要在职工群众中，树立一种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风气。克勤克俭、厉行节约，是经营企业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①只有在企业的全体职工群众，对这个方针有了切实的领会，并且在行动中坚决贯彻执行的情况下，企业才能不断地降低产品成本，促进生产迅速发展。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页。



自然科学和实际应用

何祚庠

在自然科学史上，关于自然科学和它的实际应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历来争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有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为科学而科学”，主张研究所谓“纯粹科学”，反对科学的实际应用，认为讲究科学的“应用价值”是一种“功利主义”。另一种是狭隘的实用观点，主张一切科学工作都仅仅从属于某些狭隘的实际目的，轻视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的的重要性。这两种观点，都是各执一端，因而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并将自然科学的发展引入歧途。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①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也就是说是为了实际应用。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常常会发现自然科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从而又推动自然科学的研究。反过来，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学说对于客观的反映愈加正确、深入和适用的范围愈普遍，也就愈能获得广泛的应用价值。“为科学而科学”论者的错

误，在于割裂了真理和应用之间的联系，并在科学实践上否认自然科学的应用价值，否认改造客观世界的极端重要性。狭隘的实用观点的错误，在于不了解自然科学中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因而在科学实践上忽视系统研究理论的必要性。如何正确认识自然科学和它的实际应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是说，是为了实际应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自然科学研究中认识客观真理和实际应用之间存在着若干复杂的联系，必须避免使自然科学的研究单纯地从属于若干眼前的、狭隘的实际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科学总是适应于一定的社会需要而发生发展的，离开了这种社会需要，科学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社会需要其中特别是生产实践的需要，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力。恩格斯指出，“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数个大学更加把科学推向前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281页。



进。”^①这个论点也完全适用于现代科学。例如，在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原子核物理只是世界上少数实验室进行研究的学科。到了四十年代，由于发现了原子能的实际应用，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其中特别是中子物理的研究，才如雨后春笋一般地茁长起来。这些年来，从理论到实验结果，都有重要的进展。又如，等离子物理的研究，在过去只有少数天体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对它发生兴趣。很多物理学家甚至对等离子体这一名词也是较陌生的。然而一旦阐明了等离子物理和可控热核反应之间的联系以后，很快就引起了科学界比较普遍的重视，科学杂志上关于等离子物理的文献，在数量上便有几十倍成百倍的增加。由此可见，科学的发展，主要是由它的应用价值来决定的。对于科学工作的评价，主要也是由它在实践上所起的作用来确定的。忽视或者轻视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就会削弱自然科学和生产实践之间的联系，从而也就削弱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因此，对于我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必须强调研究自然科学的社会目的性，将自己的科学工作贡献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那末，我们强调自然科学工作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功能，是不是如“为科学而科学”论者所批评的那样会流于“功利主义”呢？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功利主义”。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

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②毛泽东同志这段话虽然是针对文艺工作，对文艺工作者讲的，同样，它也完全适用于自然科学工作。

从哲学上说，“狭隘的功利主义”在思想倾向上属于庸俗唯物主义，其特点是着眼于若干狭隘的实际目的，而忽视对于一些远大目标的追求。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只要是按照严格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前提是经过严格考核的，论证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小心推敲过的，并经过一定的实践检验，那末这类科学工作也就能在这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贡献，或迟或早地发挥出它的社会功能来。自然科学，只要它是客观真理，就一定具有应用价值。人们只有对自然科学研究得愈深入，也才愈能认识它的应用价值。这是因为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它的实际应用之间有较复杂的联系，如果把这种联系简单化了，就不能全面地来理解自然科学的社会功能。

社会生活对自然科学的需要是多方面

① 《致亨·施塔尔肯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字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504页。

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6页。



的。除了当前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外，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会不断产生新的实际需要。这种实际的需要和科学工作之间的联系，常常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的。

举例来说，天文学的研究乍看起来似乎是容易“脱离实际”的。宇宙中的星球，可能离开人们有好几万万光年。但天体上却有地球上难以做到的热核反应过程。作为近代的尖端技术之一的可控热核反应的研究，常常需要查考天文学上的资料。而所谓热核反应这个观念，也首先是由天文学的研究中得出的。特别是在星际航行的时代，假如离开了天体力学的精密计算作为先导，就没有可能实现任何星际航行。

社会生活对自然科学还有若干长远的根本的需要。在科学发展的一定的时期，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常常会酝酿出对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一些重大科学课题。这些问题总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以致于不可能期望它在短期内获得解决。但由于这些长期的根本性的问题对于人类发展前途将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仍应分出一部分力量来进行研究。例如，关于新型能源的利用问题，就是这类基本问题之一。就目前地球上所发现的石油和煤的蕴藏量来看，很多人估计只能够供人们数百年的使用。即使加上铀、钚等原子燃料，也不过多延长若干时间，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而像可控热核反应等一类问题的研究，便成为十分重要的了。虽然这类问题的解决是很困难的，但这无疑是科学上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在科学工作中，我们除了要看到今天的和明天的实际需要以外，还应看到社会生活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的需要。在自然科学工作中，有许多理论研究并不以某一生产部门，某一实际问题为对象，而是以发展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为直接的目的。初看起来，似乎这些理论的研究是和实际问题无关的。然而仔细分析一下便可以看出，许多实际问题的彻底解决却有赖于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特别是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的解决，就能为许多生产部门带来实际利益。

量子力学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量子力学所探讨的是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初看起来，似乎量子力学的研究只是为了解决粒子和波动的二重性这一类理论问题而已。然而随着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解决，便在技术上引起了一系列的革命。不论是在原子能、半导体或光量子放大器等等新技术中，都离不开量子力学的指导。显然，量子力学的原理对于今后许多技术问题的解决，还将继续起着原则性的指导作用。

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对于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不只是对于明天的或是后天的问题的解决，要取决于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我国目前所碰到的许多重大的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就有许多急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①。恩格斯的这段话是特别值得我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页。



們重視的。

自然科学理論的研究有一系列重要的特点。第一，在理論研究中，要求从大量的資料出发，因而有許多工作是以系統搜集某一方面的材料作为它的直接目的，以便在这些資料的基础上发展理論研究。例如，各种化合物性能的測定，物理常数的測量，植物譜系的編制等等。这类工作的特点，在于要求材料的完备性。很难說这一部分的材料是有用的，而另一部分材料是沒有用的。这类工作要求以整套資料作为一个整体，供应各方面的需要。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常常离不开查考这类資料。

第二，在自然科学理論研究中，还有一类工作，其直接的目的是发展一种新的研究工具或新的实验技术。在现代科学研究中，这方面的工作是很重要的。科学史上常有的情况是，随着一种新的研究工具的出现，就有一門新的科学領域随之而出现。例如，原子核物理的发展就和加速器的研究分不开，而晶体結構的研究就直接取决于X光技术和中子衍射技术的发现。在实验工作者中，常常极其重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因为工具的改善往往能极大地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

第三，在自然科学理論研究中，有大量工作以直接发展某一种理論为目的。理論研究的特点，便是要求严格的证明，因而有大量的科学工作是为了严格证明某一理論、某一思想或某一結論。这在科学史上可以找出不少的例子。一个新的科学思想已早在酝酿之中，但是为了要确切地证明它，却常常要

花費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工夫。在流行的科学文献上，特别是基本科学的研究里，有很多的工作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做实验工作的同志常有的一种体会是，一个实验做起来可能只要一、二个小时就够了，但是仪器的校正，性能的考驗，数据的处理等等，却要花上几个月、几年的时间。这些工作都只是为了严格地证明某一思想、某一理論而已。在科学工作中，在“严格证明”上所耗費的代价是必須付出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們的科学工作經得起历史的批判，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还有一类专门以建立科学体系为目的的研究工作。初看起来，似乎有点“形式主义”。例如，把牛頓力学写成拉格朗日的形式或哈密頓的形式、泊松括弧的形式等等。在量子場論中把薛丁格表象换成海森堡表象或相互作用表象。这些不同形式的算式，实际上是完全等价的，有些形式甚至比原来的形式写得更复杂，利用它們来求出解答时也更不方便。但是，这类工作的意义在于它能发展出新的体系。例如，量子力学的发展和泊松括弧有紧密的联系。量子場論的发展，要借助于牛頓力学中的拉格朗日形式和哈密頓形式。量子場論中相互作用表象的引进导致重正化理論的发现，海森堡表象却是“色散关系”理論的出发点之一。

第五，还有一类工作是对所謂“典型”問題的研究，也就是常常在一类問題中抽出一个典型进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典型的选择往



往决定于它的简单明确，而不是它的实用可能。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力学中，人们花了很大的力量去研究圆柱薄壳在轴向压力下的失稳问题，就是因为它是非线性“曲屈”理论的典型。在实际结构中谁也不会用纯粹的圆柱薄壳，而是用加筋薄壳；因而理论并没有直接的用处。然而典型搞清楚了，一大类有关的问题也就清楚了。

在探讨自然科学的应用价值时，除了看到它们有各种不同的作用以外，还必须看到各种性质的工作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由研究抽象的理论问题所得到的结论，可能在最实际的问题上有重要的应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也会提出若干需要解决的高深的纯理论问题。若干长远的根本性质的工作，常常是在某些迫切需要的实际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研究远期需要的理论课题的同时，却可能发展出若干新的实验技术，同样为某些实际工作所必需。正因为自然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

联系，因而也就为正确解决自然科学和实际应用相互关系的问题增加了复杂性。把这种复杂关系设想得简单化了，就会抹煞一些重要工作，把它们贬为没有价值，而这将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但是，在正确解决自然科学和实际应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时，仅仅看到自然科学有各种可能的用途这一点，也还是不够的。实际生活对于自然科学虽有多方面的需要，但在不同需要之中，仍有轻、重、缓、急的区别。在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之中，也有主要、次要之分。有些理论问题是带有关键性的，它的解决常常涉及一大片其他科学问题的解决；而有些问题却是个别性的枝节性的问题。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先应该把他们的精力集中在那些重大的问题上，但另一方面又应对于各种性质的工作作出适当的安排。总之，要使我们的科学工作既能保证目前需要，又能适应长远的利益，从而更有效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和觉悟性問題

· 宁 可 ·

中国农民战争史問題，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历史学界中引起了热烈的討論。經過討論，有些看法已經一致或趋于一致，有些看法还有較大的分歧。封建社会的农民能不能認識自己进行的斗争，認識到什么程度；換句話說，农民战争是自发的斗争还是自觉的斗争，它的自发性或者自觉性的具体表現如何，就是在看法上有分歧的問題之一。

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自发的革命而不是自觉的革命。这是多数討論者都同意的。革命的自觉性指的是，革命階級認識到自己的階級利益与历史任务，認識到自己斗争的前途，建立革命的理論和自己階級的政治組織，积极地为自己階級的利益及前途而斗争。这种自觉性当然是封建社会的农民所达不到的。把这种自觉性加到农民战争身上，是一种把农民战争现代化的傾向。但是，这不等于說农民自发的斗争中不存在某种程度的觉悟性，也不等于說两千年間农民斗争的觉悟程度沒有任何增长。如果为了強調农民战争的自发性，連农民在斗争中表現出来的某种程度的觉悟性及这种觉悟性的逐步增长也一并否定，那就不免走向贬低农民革命性的另一个极端了。

农民长期面对着自己悲惨的生活与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压迫，必然对封建制度和自

己的命运产生一定的認識(尽管是模糊的、表面的甚至是歪曲的認識)，产生自己的階級意識。这一方面表现为对地主階級与封建制度的憎恨，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自己的解放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农民由此而产生强烈的革命要求，并且从他們的階級地位和历史地位出发形成朴素的平均主义与朴素的平等思想。列宁說过：“劳动农民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敌視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剝削者的心理，”^①“他們极度憎恨旧的秩序，他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了現制度的一切重担，他們自发地渴望从这些重担下解放出来并找到美好的生活。”^②列宁对俄国沙皇专制統治下的农民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封建制度統治下的农民。这种农民的階級意識是农民革命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就是农民的斗争帶有一定程度的觉悟性的原因。

农民在斗争中表現出来的觉悟性是逐步增长的。这种增长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在那些規模較大、时期較长的农民起义中，农民的觉悟程度常常随着斗争的发展而有所增长。像唐末农民战争的“誣宦豎柄朝，垢蠹紀

① 《无产階級专政时代的經濟和政治》。《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3頁。

② 《托尔斯泰和无产階級斗争》。《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2頁。



綱，指諸臣与中人賂遺交构，状餘貢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贓者族”^①的露布和推翻唐政权的号召；明末农民战争的“均田”“免赋”口号及推翻明王朝的目标；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等，都是在斗争过程中提出或者丰富完善的。至于农民在斗争过程中总结經驗教訓，制定与修改斗争计划，加强队伍的組織和紀律，建立各种制度，提高軍事技术和指揮能力的事例，那就更多了。另一方面，封建社会本身的发展使得封建社会的基本階級关系、基本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在人們眼前，而前代的农民战争又給后代留下了丰富的經驗。因此，尽管有反复和曲折，一般說来，越是后来的农民战争表现的觉悟水平越高。秦末农民战争还只能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模糊的向地主階級封建王朝特权地位挑战的口号。他們还只是开始不相信压迫他們的地主王朝是不可动搖的，开始感觉到（还不能說是了解到）不能听凭統治者的摆布，必須共同进行反抗，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們还認識不清自己和地主階級的区别，認識不清他們的斗争目标和地主階級起兵目标的区别。宋代农民起义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口号，反映农民已經在貧与富、貴与賤之間划出一条界綫，要求改变封建社会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的現象，开始模糊地意識到他們反对的不仅是个别的王朝、官吏、地主，而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意識到穷人应当团結起来与富人对抗，爭取他們朴素意識所理解的那种經濟上的平均与政治上的平等了。到了明代，在土地兼并激烈的情況下，农民开始意識到貧富貴賤差别的根源在于土地占有情况的不同，从而提出“均田”的口

号，这表明农民对封建制度的認識又提高了一步。鴉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資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封建社会开始瓦解，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彻底暴露与空前尖銳，继承了两千多年来无数次农民起义的光荣傳統与丰富經驗的太平天国革命，成了旧式农民战争的高峰与总结。在沒有先进階級领导的情况下，农民对封建制度的認識和他們革命的階級意識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发展到了頂点。太平天国的英雄們已經在封建社会农民所能达到的觉悟水平上，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把地主当作一个階級来反对了；他們已經在宗教的外衣下，比較系統地提出了朴素的平均思想与朴素的平等思想，并且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理想的“天国”来和封建制度相对立了。他們利用宗教形式，把一切封建社会不合理的現象概括为“閻罗妖”的罪行，号召人們站到“皇上帝”一边，打倒万恶的“閻罗妖”。在这里，“皇上帝”与“閻罗妖”的斗争直接反映了人間的斗争，反映了太平軍与清朝統治者斗争，反映了地主与农民的斗争。在实际斗争中，太平天国的英雄們又用“遇妖即誅，見民必救”这类口号，力求划出人民和封建統治者的界限。他們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帝”，“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这样廢除私有制的理想，从而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提出了一切人都需要参加劳动，收获产品不得私有，平均分配，共同消費的理想，从而否定了不劳而食的思想，否定了地主階級剝削的合法性和社会上貧富不

^① 《新唐书》第225卷下，《黄巢傳》。



均的合理性；他們提出人与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反对皇帝的特权，从而对封建等級制度提出了疑問；他們又用基督教的一神教思想来反对傳統的封建神权与儒家思想，从而否定了封建意識形态的統治地位。由此可見，太平天国已經在一种朴素的与幻想的形式下，認識到他們的斗争是反对封建制度与地主階級的，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理想的“天国”了。說它是朴素的，因为这是农民階級对封建制度与自己前途的直观的認識，而非对社会发展規律的真正理解；說它是幻想的，因为它終究沒有科学地认清地主階級的本质，封建制度的本质；而其“天国”的理想，虽然在革命高潮中成为群众反抗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与行动綱領，但归根到底又不过是一种企图保持小农經濟永世长存地位的落后的、空想的图案。列宁在談到农民对旧制度的憎恨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时曾指出：“同时这些群众在革命中还表明，他們的憎恨不够自觉，他們的斗争不够彻底，他們仅仅在狭小的範圍內寻求美好的生活。”^①因此，尽管是代表旧式农民战争中农民觉悟性增长的极限的太平天国革命，也仍然不可能越出自发斗争的範圍。

蔡美彪同志在《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討論中几个問題的商榷》一文中，为了強調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強調农民的沒有觉悟，就认为农民沒有反抗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他們只是以封建的綱紀、封建的理論来反抗封建統治，往往是借助于地主階級的王朝的名义、皇帝的名义而不是以自己的階級的名义，来表达自己的向往和自己的利益。^②这种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处于被統治地位和依附地位的农民，在精神生活方面，一般地說，不可能創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而是受着在封建社会精神生活中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思想的支配。何况农民的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的階級地位及由此而产生的保守、狹隘、散漫、缺乏远見、私有观念等等階級意識，还与同样根源于私有制的封建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就使得农民不仅不能避免封建思想的侵襲，而且他們的落后思想还常常和封建思想結合在一起。因此，农民想发家致富，使自己成为地主，或成为大小官員，光宗耀祖。这是很自然的，不看到这点是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农民又是一个与地主有根本区别的階級。农民与地主的尖銳矛盾，不可能不使农民产生对地主階級的仇恨与解放自己的願望，并且在个体生产的基础上，在企图保护农民劳动者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經濟上的朴素的平均主义与政治上朴素的平等思想。他們企图用某种平均主义的办法滿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用“有飯同吃，有衣同穿”和“等貴賤”的办法，消灭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压迫。这些就是封建时代的农民的革命思想，也是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最进步最革命的思想。农民革命的思想动力，只能是来自农民的革命思想，而不是来自农民的落后思想与封建思想。后二者一般只能起模糊和敗坏革命意識的作用。而革命的爆发与发展正是农民的革命思想战胜了落后思想与封建思想影响的結果。不看到这些，就更不对了。

① 《托尔斯泰和无产階級斗争》，《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2頁。

② 《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农民战争的某些口号纲领，像“等贵贱、均贫富”，“割富济贫”之类，是很难视之为封建的纲纪与封建的理論的。同样是对待北宋时期社会上的贫富不均现象，地主阶级保守派如司马光、苏辙等公开宣称贫富的区别在于人们才性愚智的不同，富民是国之根本，应当“贫富相恃”，坚决反对“破富民以惠贫民”。地主阶级改良派的王安石，也不过只希望做到用封建国家的力量施行“青苗法”之类的改良办法来“抑兼并、济贫乏”，依然没有也不可能去触犯封建所有制。只有王小波、李顺起义才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并且用杀掉贪官污吏、征发富人财粟分给贫民的办法来贯彻这一主张。明末曲阜举人孔尚铎建议“限田”，办法不过是“令本地有司，以理劝諭本地乡官（官僚地主），于地之太多者或放其购还。”^① 奏上之后，崇禎令兵部复議，兵部謂：“均富以济贫，人情则不安。”其事遂寝。而明末农民起义軍则在“割富济贫”口号下发动农民夺回被地主强占的土地，来贯彻自己的主张。不管农民的认识多么模糊，办法多么不彻底，上述那些口号終归是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最革命、最进步的口号，它們已經超出了任何封建的纲纪与封建的理論的範圍，它們的阶级性与革命性終归不能磨灭，只能视为与封建思想对立的农民革命意識的結晶。

同样，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也并非总都是借助地主王朝或封建皇帝的名义来表达自己的向往和利益的。特別是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更是如此。四世紀初到五世紀初約百年之間，东起山东，西到四川、陝西，南到安徽，不断发生以宗教領袖兼农民起义

領袖李弘的名义相号召的起义。方腊起义，自号“圣公”。明中叶刘六刘七起义套用元末刘福通起义的口号，称“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②（刘福通起义口号末句为“重开大宋之天”）。明末农民起义領袖常用水滸人物作为自己的名字或綽号。太平天国革命更是借助一个与封建制度对立的理想的“天国”来表达自己的向往，借助一个与“閻罗妖”对立的“皇上帝”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借助一个从不見于圣贤經傳的政教合一的“天王”来与封建皇帝对抗。这些，都很难說成是借助地主王朝与封建皇帝的名义，而只能视之为农民用自己阶级的名义来表达本阶级利益与向往的一种探索了。

但是，农民的革命斗争具有自发性质，农民的革命意識是模糊与贫乏的，他們不能真正看清自己斗争的意义与前途，不能在实际斗争中真正划清革命思想与落后思想、封建思想的界限，再加上傳統的、习惯的因素，这就使农民在斗争中总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深厚影响，即使是把农民的革命思想发展到极致的太平天国革命，也仍然如此。在太平天国的纲领制度里，革命思想、落后思想、封建思想混杂在一起。可以看到，在基督教和儒家大同思想的外衣下，燃燒着农民对地主阶级仇恨的火焰，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封建特权，主张政治平等、严格的紀律与禁欲主义等农民的革命思想在閃爍着光輝；同时，也可以看到家长制，严苛煩瑣的刑律，迷信等农民落后思想的表现，以及在礼仪、

^① 轉引自李文治：《晚明民变》，第145頁。

^② 《皇明資治通紀》第33卷。



科举、官制、爵制等许多方面反映出来的封建思想的影响。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具体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封建思想影响，就更不胜枚举了。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意识中的矛盾与局限。

在农民所受的封建思想影响中，那些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之类的思想当然只能是革命斗争中的消极因素。但是有三种情况却值得进一步分析。

第一种情况是，农民在斗争中常常借用某些地主阶级的思想、主张作为自己的口号纲领，而其中的一些却对革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些对革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地主阶级的思想主张，在封建社会条件下，对于改变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是有某些好处的，如惩治贪官污吏、奸臣宦官，减轻赋税徭役，抑制土地兼并之类就是。这些思想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农民的利益，反映了农民斗争的要求，与农民的革命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因此可能为革命的农民所接受和利用。

不仅如此，农民还往往根据斗争的需要，在这些借来的地主阶级思想躯壳中贯注了新的革命的内容，使它们获得了在地主阶级那里从来未曾有过的意义。

秦末农民战争中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是在战国以来社会变动激烈，统治阶级人物的政治地位升降不常，“布衣卿相”时常出现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个口号所反映的思想，本来一般只含有鼓励人们顺着封建的阶梯向上爬的意思。但是，对于困在大泽乡、处于死亡边缘的八百失期

戍卒来说，摆在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不是俯首贴耳充当秦朝苛法的牺牲，就是拚死反抗比这支小小队伍强大得不可比拟的秦王朝。所谓“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正是他们境遇的最好写照。在这种情势下，英勇的农民选择了“死国”的道路，决心发动起义。这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号召，尽管还是为了“取而代之”，反映了农民并没有认清自己和地主阶级的区别，没有认清他们的起义目标和地主阶级起兵目标的区别，但是，这个口号已经不再意味着鼓动戍卒们在封建统治者允许的范围内去猎取功名富贵（这在当时情况下是一种毫无现实意义的可笑想法），而只能是意味着用渺茫的希望激起他们死里求生的反抗意志，鼓励他们向地主阶级和封建王朝的特权地位挑战，鼓励他们通过斗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个从盛行于汉代的谶纬之学里抄来的、带有浓厚宿命论气息的口号，在黄巾起义军那里，并不像地主阶级其他的类似说法一样意味着“天命”在封建统治者之间的转换，而是鼓励农民戴上黄巾，代表“上天”起来改变封建统治者给他们安排的命运，推翻代表腐朽汉代统治者的“苍天”，建立农民自己的“黄天”。

明末农民战争的“均田”口号，也应如此理解。我们说“均田”的口号来自地主阶级，不仅因为它出自一个参加了农民军的出身地主阶级的李岩的建议，主要的是，从西汉以来，“限田”、“均田”之类的思想常常是一部分地主阶级对待严重的土地问题与尖锐的阶级矛盾的主张。从北魏到唐中叶，还出现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以“均田制”为名的封建国



家土地制度。“均田制”破坏之后，“均田”的主張长期以来仍旧为人所艳称，并且一再企图实行。一直到明末，“限田”、“均田”之議仍然流行。一千多年中，地主阶级尽管对“均田”作了各色各样的理解，提出了各色各样的建議，然而所有的理解和建議都沒有超出地主阶级利益的范围，所指的不过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范围内适当地限制一下土地的集中（如前述明崇禎时孔尚絨的限田建議），最好的也不过是分点官地荒地給无地少地的农民，甚至只是在“均田”的名义下均平一下賦役負担（像明末朱国楨在湖州一带引起軒然大波的“均田”建議，不过如此）。总之，在地主阶级那里，“均田”仅仅是一个改良的口号。这个同样的口号，在农民革命那里，却获得了不同的意义。李岩提出的“均田”口号的具体内容，現在已不可考，可能根本就沒有訂出过实行的制度、办法，但这并不等于說农民軍沒有具体实施过“均田”的主張。据《出劫紀略》所載，李自成的大順政权官員到达山东諸城之后，“以割富济貧之說，明示通衢，产不分久近，許业主认耕”。于是农民紛起夺回土地，“一邑紛如沸釜，大家（地主）茫无恒业。……互室膏田一无主人，任侵占而誰何。……不为占据者，惟有焚掠后荒田耳”。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当时农民都曾經分到了土地，甚至把地主消灭了。但是，大順政权管轄下的諸城，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却是事实。“均田”的口号既然深入人心，起过“煽誘”大批农民参加革命队伍的作用，而且如前所述，明朝統治者亦會把“均富济貧”之說与“限田”的建議联系起来，可以推想这是当时流行的看法，

因此，把大順政权这种在土地問題上“割富济貧”的做法，当成革命农民对“均田”口号的理解与实施，应当是可通的。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錯，那就可見“均田”的口号在农民那里已經超出了地主阶级允許的范围，获得了新的革命的意义。

第二种情况是，斗争的发展必然向起义农民提出建立比較系統、严密的組織与制度特别是政权組織的需要。但是，农民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使他們不能創造出真正符合自己革命需要的新型的組織制度来，只能从現存的組織制度里汲取灵感。农民朴素的革命的阶级意識可以产生原始的、农村公社类型的組織制度。这种組織制度往往披着宗教的外衣，但有时也与宗教沒有什么关系而采取山堂水寨，聚义結盟的形式。这种类型的組織制度較多地反映了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和朴素的平均主义与朴素的平等思想，如合議制、領袖与群众間一定程度的平等关系、严格的紀律、生活上的平均主义等等。这是农民創造性的光輝表现。但是，它也反映了农民阶级保守、狹隘、分散等等缺点。当革命在較大的規模上与較大的区域里发展起来以后，当革命面临着推翻封建王朝的历史任务时，这种原始的、簡陋的农村公社类型的組織制度，就不足以应付复杂的革命形势，也无法和在当时是最系統、最严密的封建王朝的政治体系相抗衡。因此，农民在斗争中部分以至全部模仿封建的組織与制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了。在农民战争发展时期，模仿封建的組織与制度这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作法，曾經加强了起义軍的政治影响、組織紀律与作战能力，



在一定时期内对农民战争起过积极作用。当然，在起义军模仿封建的组织与制度的同时，也就接受了作为这些组织制度的思想基础的封建政治观点。然而，封建的组织制度的形式和它们的思想基础之间是有些区别的，在革命斗争中起积极作用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一定时期里农民可以利用封建组织制度的形式来从事反封建斗争，但随之而来的与农民革命利益有根本矛盾的封建政治观点却可能暂时不起决定影响。黄巢进入长安后建立大齐政权，改元金统，号“承天广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尊妻曹氏为皇后，政府中设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御史中丞、谏议大夫、翰林学士、枢密使、京兆尹、将军、游奕使诸官职，完全模仿唐王朝的政治体制。可是这个新政权仍然建立在与唐王朝及地主阶级尖锐对立的基础上。绝大部分的地主贵族仇视它，不承认它，拒绝在新政府做官，写诗在尚书省门上讽刺它。地主文人韦庄的《秦妇吟》轻蔑地骂它是“柏台多士尽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可见这个政权的成员多半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人。大齐政权建立之后，一方面领导农民军继续与唐王朝斗争，一方面对它管辖范围内的地主贵族进行镇压。张直方一案，即杀掉唐朝高级官僚贵族百余人。一般衣冠士族，也是“罹难者多”，往往“赤族”，“闾门无噍类”，以至长安城中出现《秦妇吟》中描写的“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景象。未死的地主贵族，大多四散奔逃，“窜伏窟穴以保其生”，至有以卖饼为业的。以门阀相炫的世家大族经过这次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李自成一六四三年

在襄阳称新顺王，模仿明政权的组织制度正式建立政府，此后这个政府在西安及北京又有两次扩大与加强。在采用了封建政权的组织形式后，起义军原来的政治口号如“均田”、“免赋”等并没有改变，而且有所发展。起义军在西安就曾运用这个政权的力量，镇压最反动的明朝官僚，迫令乡官富绅助饷。进入北京后，大顺政权有计划地分别处决罪大恶极的明朝官僚。又置比饷镇抚司，对明朝大僚，除少数知名之士外，凡素有贪名而致富者，俱发刑官夹打，追索赃银。畿辅、山东、河南的大顺地方官，到任后也是“首称助饷，绅衿受胁”。在山东诸城，“闾官”“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分久近，许业主认耕”，号召农民起来夺回田产。规模较小的明代邓茂七起义，称“割平王”，“设官署”，“封官职”，“置里图甲役”。但是每次破城，“纵火焚烧衙厅”、“官舍”、“司房”、“廨舍”、“纵狱囚”、“取册籍”、没收“县库”金钱，“民兵被杀者不可胜计”，仍然不失农民起义本色。十九世纪中叶与太平天国同时的广西大成国起义，曾经攻克潯州，改称秀京，国号大成，年号洪德，设官分职，委派官吏，征收赋税，铸造钱币。大成国领袖之一隆国公黄鼎凤，在他所颁布的告谕中指出：“田地为务农之本，天下旱畚水田，均为我农所辟，田主历代收租，实干天怒！自此以后，仍照旧制，田主不得借故收租。”这种告谕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政权都不可能颁布的。可见农民虽然模仿了这些封建的组织制度和制度，但是在封建的组织制度的形式下面，活跃着的主要仍是农民的革命思想，而不是封建政治观点。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然而却不是一个不可理解的现象。



第三种情况是，某些参加起义军的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分子曾对农民革命起过重要的作用。像李密之于瓦岗军，刘基、宋濂、李善长之于朱元璋军，李岩、牛金星、宋献策之于李自成军都是。在他们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和知识才能服务于起义军时，他们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也随之在起义军中散布开去。但是，却不能像有的同志那样，把他们的作用仅仅归结为以封建的理论影响乃至指导、支配了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对他们作用的估计，不单要看他们如何影响农民军，还要看农民军如何接受他们的影响；不单要看他们散布封建思想影响，还要看农民革命思想如何影响了他们；不单要看他们的出身和思想，还要看他们的活动客观上代表了哪个阶级的要求和利益。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如李岩，原先就同情农民，跟群众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并因此受到封建政府的迫害，他的参加起义，标志着对地主阶级的背叛，成为农民革命的领袖。他劝李自成“勿杀人，散所掠财物，收人心以图大事”，都符合农民革命的利益。他所提的“均田”口号，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至于另外一些人，虽然参加了起义，但未改变地主阶级立场，像刘基参加朱元璋军，元旦时朱元璋率部下向所设的小明王韩林儿御座行礼朝贺，“基独不拜，曰：牧豎耳，奉之何为！”^①就是一例。但是，对他们的作用也要具体分析。他们的某些有关军事行动的建议，如刘基为朱元璋指陈攻取张士诚、陈友谅及北定天下之策等，阶级色彩比较淡薄，客观上符合农民的革命利益。另一些活动，

如仿照封建政权形式建立农民军的组织制度等，一方面在客观上符合了农民当时斗争的需要，有助于农民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农民领袖接受了封建思想的影响与指导，到一定时期就促成了农民战争的失败或转化。还有一些活动，如制礼作乐，讲经论史，以及像刘基、宋濂等人影响朱元璋对白莲教与韩林儿龙凤政权的态度从支持变为敌视，只强调民族矛盾而不提贫富冲突等，则纯粹起了促使农民军领袖阶级立场转化的作用。因此，笼统地把参加起义的地主出身的分子都视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把他们的作用全部归结为用封建理论影响乃至指导农民军的行动，就未免贬低了农民革命意识在斗争中的作用，并且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看得太简单了。

正因为农民不可能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无法真正划清革命思想和落后思想、封建思想的界限，无力抗拒落后思想的发展与封建思想的侵蚀，也由于农民革命思想的贫乏及其空想性质，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民战争面对的各种问题，因此，在农民战争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农民战争取得一定胜利的形势下，农民的革命意识不仅无法发展，反而往往不能保持。农民思想中的落后因素滋长起来。像太平天国初期起过巨大的组织动员作用的上帝教，到太平天国后期却成了妨碍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的凝固僵化的教条，导致了太平天国后期政治方向上的模糊混乱与摇摆不定。更重要的是，农民的斗争

^① 《明史》第128卷，《刘基传》。



受地主階級思想支配的傾向越來越顯著。那些從地主階級思想武庫中借用的貫注了革命內容的口號綱領，往往恢復了它們本來的意義，變成了農民戰爭中的消極因素。在大澤鄉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激勵群眾反抗暴秦的陳涉，當局面打開之後，真的做起王侯將相的美夢來，以至被他舊日的伙伴譏為“涉之為王沉沉者”。而封建的組織制度形式與出身地主階級的分子的作用越大，農民戰爭所受的封建思想影響也就越深，農民軍領袖向地主階級的轉化也就越快。農民軍利用封建組織與制度形式和出身於地主階級的分子從事反封建鬥爭，結果不是反掉了封建而是自己被封建制度所俘虜，被地主階級所改造。這些對起義起過積極作用的封建組織制度與出身於地主階級的分子終歸又成為起義失敗或變質的重要因素。這一切，正說明了農民覺悟程度的局限。

總之，舊式農民戰爭終究是自發的革命。革命農民的覺悟程度無論如何不能超越他們階級的與時代的限制，越出自發的範圍。不看到這點，過分夸大農民戰爭的覺悟性，把封建社會的農民的覺悟程度看得跟今天的無產階級差不多，這當然不對，是一種非歷史主義觀點。但是又必須看到，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農民的革命思想及其覺悟程度在鬥爭中的逐步增長，終究是十分可貴的。這是中國人民的光榮傳統，是珍貴的历史遺產。這也正是農民能夠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接受無產階級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從根本上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取得反封建鬥爭

的徹底勝利，最後解放自己的基礎。我們研究封建社會的農民戰爭，就應當從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出發，更注意農民戰爭的這個方面，肯定這個方面，歌頌這個方面。只有這樣，才有助於闡明封建社會階級鬥爭的規律，有助於闡明農民革命的偉大歷史作用，有助於總結舊式農民戰爭的經驗教訓。如果像蔡美彪同志那樣，說是反對把農民革命現代化，實際是脫離了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用今天無產階級的覺悟水平去苛求封建社會的農民，從而片面夸大農民戰爭的自發性質，甚至否認農民有任何革命思想與階級覺悟，以致混淆了農民與地主的階級界限。這就不免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表現了另一種非歷史主義觀點了。

封建社會的農民是一個既具有革命性但又遠較無產階級落后的階級，舊式農民戰爭又是爆發在一個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沒有新的階級力量和先進的政黨的時代。階級與時代的限制反映到農民的鬥爭中來，就使得農民戰爭的許多方面都帶有明顯的矛盾性質。農民的鬥爭具有某種程度的覺悟性，但這種覺悟性的增長却始終越不出自發鬥爭的範圍，就是這類矛盾着的現象之一。如何正確地理解與闡述農民戰爭的自發性與覺悟性之間的關係，使得一方面不致把農民革命無產階級化，另一方面又不致貶低農民戰爭的革命性，混淆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界限，是一個頗為複雜而困難的問題。本文對這個問題作了一些粗略的，遠非成熟的說明，謹供同志們討論。

